

浙江儒学总论：从王充到马一浮

——论浙江儒学的思想特色与精神价值

吴光¹

【摘要】 本文鸟瞰式地论述了浙江儒学在两千多年历史长河中的发展脉络，从中提炼出浙江儒学的学术特色与基本精神，进而论述了浙江儒学的历史贡献与当代价值。作者认为，浙江儒学有三大学术特色：一是多元包容，二是经世致用，三是从民本、亲民到民主的思想转型。浙江儒学的基本精神突出表现在“实事求是”的求实批判精神，“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经世致用，知行合一”的实学精神，“崇尚气节，正直敢言”的豪杰精神，“教育优先、人才第一”的文教兴邦精神五大方面。浙江儒学的典型思想型态是王充以“实事求是”为宗旨的求实批判之学、叶适以“崇义养利”为核心价值的功利之学、王阳明以“致良知”为核心命题的“良知心学”、黄宗羲以“民主君客”为核心观点的“力行”实学、马一浮以“六艺该摄一切学术”为核心命题的现代新经学。他们的思想宗旨与学术命题不仅在当时开风气之先，而且具有现代性与普世性，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创新与实践治理模式的良好借鉴。

【关键词】 浙江儒学 脉络 特色 基本精神 当代价值

一、关于儒学与浙江儒学的界说

关于儒学的定义五花八门。现在“百度网”关于“儒学”的定义是：“儒家思想也称为儒教或儒学，是先秦诸子百家学说之一。由孔子创立，最初指的是司仪，后来以此为基础逐渐形成完整的儒家思想体系，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影响深远。它是中国影响最大的流派，也是中国古代的主流意识。儒学是一种学说，儒家是一个阶层，儒教是一种信仰。”这样的定义虽然并不完全准确，但八九不离十，一般是可以接受的。需要补正的是，所谓“司仪”是指“儒”，而非儒学。儒家与其说是一个“阶层”，不如说是一类“群体”。所谓“信仰”也不只“儒教”所专有，“儒学”也是一种“信仰”。“儒教”之“教”的古今涵义并不相同，古指“教化”、“教育”之“教”，今指宗教之“教”。“儒学”虽是一种信仰，却不是宗教意义上的信仰。

中华民族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儒学即是中华文化的主干与灵魂。儒学作为一种系统性学说，是由孔子所奠定，由历代大儒所充实发展的道德人文主义思想体系。其中若干核心价值观念，可以追溯到孔子以前的上古时代甚至史前时代，例如“孝”“礼”观念，在《诗经》《尚书》《周礼》《周易》《春秋》等上古图书中到处可见。至于各种礼仪制度，则在夏、商、周时代已经初具规模，周公旦的“制礼作乐”不过是损益前代礼乐、集礼乐制度之大成罢了。到孔子提出“克己复礼为仁”从而建立了一套以道德之“仁”为本体、以伦理之“礼”为外在规范、以人生的意义与价值为终极关怀的“仁本礼用”之学，同时也奠定了古典儒学的基本思想模式。

儒学从诞生之日起，即与国家政治生活与民众日常生活结下了不解之缘，逐步形成集政治、伦理、道德于一体的经世致用之学。周公为何要制礼作乐？其根本目的即在安定人心、稳定政权、期冀天下太平。孔子之所以周游列国、删述六经，其目

作者简介：吴光，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浙江省儒学学会会长，国际儒学联合会荣誉顾问。（杭州 310007）

基金项目：2018年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浙江文化研究工程”第二期重大科研项目最终成果；浙江省社科规划办基金资助。

的也在“修己以安百姓”。后世儒家之所以纷纷著书立说，开宗立派，其根本目的也在经世致用。孔子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这十分生动地体现了儒学“经世致用”的基本特色。

而所谓“浙江儒学”者，是指渊源于古越，借鉴、传承自中原，成型于汉魏，兴盛于宋元明清，转型于近现代的浙江地区的儒学。较之中原大地的孔孟儒学，浙江儒学可以说是后起之秀。但儒家思想体系中的某些观念元素，则也可以从古越先民中找到佐证。例如儒学的“天人合一”观念，我们可以从河姆渡文化遗址中的“双鸟昇日”象牙雕刻图案得到原始的印证；儒学的“万物一体”观念，也可以从良渚文化遗址中雕刻着“羽冠人面兽身”图案的玉琮得到解释。《越绝书》记载孔子高足子贡奉师命游吴越齐晋诸国，以智仁勇大德与纵横捭阖之术游说诸侯，达到了“存鲁、乱齐、破吴、彊晋、霸越”的目的，帮助越王勾践一举灭吴，称霸诸侯，深受越王欣赏与感激。

则可想见，子贡思想中的儒学种子，在当时即已播撒在古越大地。而几乎与子贡同时，从楚国宛县南游至越国任大夫的范蠡，在某种意义上也代表着浙江儒学的滥觞。我们从《国语·越语》范蠡与越王勾践的君臣对话中可以判断，范蠡是一位亦儒亦道的思想家兼政治家，其道德人格颇具“智仁勇”兼备的特色。他任越国大夫，洞察天时、地利、人和的形势变化，建议勾践采取“葬死者，问伤者，养生者，吊有忧，贺有喜，送往者，迎来者，去民之所恶，补民之不足”的民本政策（《国语·越语上》），对外“卑辞尊礼”，对内“不乱民功”，辅助越王勾践“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使越国由弱变强，最后一举灭吴，是大有作为的功臣。但他成功以后，急流勇退，隐姓埋名，弃政从商，“三致千金”，“富而好德”并散财济民，行事颇有道家风度。子贡、范蠡的思想主张，虽未形成系统的儒家思想，但为后世浙江儒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元素，在浙江儒学史上有着深远的影响。

二、浙江儒学的发展脉络

（一）浙江儒学的缘起：王充的“实事求是”与汉唐浙学

浙江儒学以王充为开端，大致可以分为五个发展阶段，即：汉唐、宋元、明代、清代和近现代时期。汉唐时期是浙江儒学的起源与成型期，其基本形态是以王充的“实事求是”之学为开端，以汉末三国时期余姚虞翻（164—232）的虞氏经学继其后。此外，还有以撰著《越绝书》的袁康、吴平和撰著《吴越春秋》的赵晔等史学家，都属于东汉初期浙江的儒家代表人物。这里，着重介绍王充的“实事求是”之学。

严格地说，浙江在先秦时代只是受到儒风流韵的影响，还没有独立的儒学体系和儒学家。研究浙江儒学，不能不将王充（公元27—约97）放在一个开拓者和启迪者的地位。我们从《后汉书·王充传》和《论衡·自纪篇》可知，王充出生于一个从北方南迁而尊奉儒家价值观的“细族孤门”之家，少年时代就学于书馆，不仅获得“乡里称孝”的道德声誉，还打下了良好的儒学根柢，得到荐入太学学习的机会。入太学后，拜当时名儒班彪（班固之父，古文经学家）为师，并受太学名师桓谭的指点，于是成长为一位博学多才的古文经学家。

另一方面，王充显然也深受吴越文化熏陶。在《论衡》中多处记载着范蠡、子贡的故事。可知王充是深知范蠡的。范蠡亦儒亦道的思想风格在王充思想中多有体现。王充自称其论自然“虽违儒家之说，合黄老之义也”（《论衡·自然篇》），是渊源有自的。或许可以说，王充正是在南北学术文化的碰撞与交融中，兼收并蓄，走出了一条兼融南北学风的独特学术道路。他超越了世儒的眼界和局限，以古之圣人事业的继承者为己任，以“通儒”的姿态吞吐百家，考论五经，确立了自己“实事求是”（《论衡·对作篇》）的治学宗旨，成就了名垂千古的《论衡》。

王充的学说，是一个复杂而深邃的思想体系。其学术精神影响后来浙学发展者主要有三，一是“实事求是”精神，二是“经世致用”精神，三为兼取众长、多元包容的精神。

王充在《论衡·对作篇》中，阐述了自己“一以贯之”的学术宗旨。他写道：

是故《论衡》之造也，起众书并失实，虚妄之言胜真美也。故《论衡》者，所以铨轻重之言，立真伪之平，非苟调文饰辞为奇伟之观也。……冀悟迷惑之心，使知虚实之分。实虚之分定，而华伪之文灭。华伪之文灭，则纯诚之化日以孳矣。

可见王充著书立说，就是为了评定虚实，匡正是非，启蒙解惑，治国化民。篇末，王充画龙点睛地指出：“《论衡》实事实疾妄……无诽谤之辞。”这句话，点明了全书的宗旨大纲，也恰当地概括了其学说的根本特点。这里所谓“实事实”是探寻、确定事物的真相，坚持实事求是；所谓“疾妄”，就是批判虚妄迷信。这充分体现了王充的求实批判精神，也集中代表了东汉初期以“实事求是”（《汉书·河间献王传》）为导向的实学思潮。

王充“实事实疾妄”的精神对后世浙学的思想传统产生了重要影响。我们从叶适对董仲舒“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思想的批判似乎看到了王充“实事实疾妄”的思路，从黄宗羲“经世应务”的学说宗旨也可看到从东汉王充、南宋浙学到清代实学的思想传承脉络，而近现代浙学代表章炳麟则对王充表彰不遗余力。章炳麟赞扬王充说：“王充……作为《论衡》，趣以正虚妄，审乡背，怀疑之论，分析百端，有所发擿，不避孔氏，汉得一人焉，足以振耻！”（《廋书·学变》）这一评价可谓高矣。此外，我们还可从一些浙学名家如南宋吕祖谦、黄震、王应麟，清代朱彝尊、毛奇龄等多次引用《论衡》的考辨可以探知王充的学术影响。

王充的“经世致用”思想，一则体现于他兼融儒法的政治观。他说：“治国之道，所养有二：一曰养德，二曰养力。养德者养名高之人，以示能敬贤；养力者养气力之士，以明能用兵。此所谓文武张设，德力具足者也。”（《论衡·非韩篇》）“养德敬贤”是儒家“德治”思想，“养力用兵”是法家奖励耕战之论。在王充看来，儒法兼用，德力具足，才是真正的文武之道。故学术旨在治国，儒法皆应实用。

二则体现在他对待文章用世的态度。他说：“（文章）为世用者百篇无害，不为用者一章无补。”（《论衡·自纪篇》）这是典型的学以致用思想。王充推崇的是“好学勤力、博闻强识”又能“著书表文、博通能用”的“鸿儒”，那些不能学以致用的人，就像虽知树木长短却不能伐木建屋、虽识花草大小却不能采草和药的人一样，正是“孔子所谓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者也（《论衡·超奇篇》）。这也揭示了王充学说的“经世致用”特色。

以往论者往往以王充为杂家¹，其实所谓“杂”者，正反映了王充多元包容，“博通众流百家之言”（《后汉书·王充传》）的治学特色。王充的思想学说，是以儒学为基础兼收博采道家、法家、墨家、阴阳家之说而自成一言之言。例如，其“德力具足”的政治论兼采儒家的德治与法家的“耕战”思想，其“天道自然”观兼采了黄老道家的“自然无为”论，其“情性”论兼采了道家和阴阳家的“调和”思想，其“薄葬”论吸取了墨家的“节葬”说，如此等等，都反映了王充学说的多元包容特色。

上述王充的思想学说标志着浙学的成型，为后世浙学的发展贡献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奠定了浙江儒学“求实、批判、民本、创新、兼容”的基本精神。对于王充思想在浙学史上的地位与影响，我在1993年的陈亮思想研讨会上首先提出了“王充是浙学开山祖”的观点，并在先后发表的《“浙学”的基本精神》（1992）、《试论“浙学”的基本精神——兼论“浙学”与“浙东学派”研究现状》（1993）、《简论“浙学”的内涵及其基本精神》（2004）、《浙学的时代价值》（2017）等系列文章中作了具体论述，在此恕不详述。

（二）宋元时期的浙江儒学：浙学的兴盛

如果说，浙江儒学在汉唐时期尚处在个体成长而无群体学派的话，那么到两宋时代就出现学术蜂起、学派林立的繁荣兴盛局面了。

中国由唐入宋，进入了一个“黄金时代”。而浙江自五代以来，即逐渐成为经济文化的中心，从而带动学术的兴盛和繁荣。两宋王朝在政治上的相对开明状态，也为儒学的多元创新发展铺平了道路。而杭州作为南宋政治中心和教育文化中心，也为浙江儒学的繁荣发展创造了优越条件。陈亮、叶适、吕祖谦、朱熹、陆九渊等南宋大儒敢于大胆向朝廷建言，体现了南宋政治的开明和儒者地位的尊崇，这些都是浙江成为南宋重镇的有利条件。

举其大者，在北宋时期，有安定先生胡瑗所开创的以重视重六经义理、强调“明体达用”的“湖学”，有永嘉王开祖首倡“道学”、永嘉九先生（周行己、许景衡、刘安节、刘安上、蒋元中、沈躬行、戴述、赵霄、张辉）开宗立派的北宋永嘉学派，有与永嘉九先生相媲美的，北宋明州（今宁波）地区的庆历五先生（杨适、杜醇、王致、王说、楼郁）。全祖望在《宋元学案·士刘诸儒学案》中说：“庆历之际，学统四起，……浙东则有明州杨杜五子、永嘉之儒志、经行二子，浙西则有杭之吴存仁，皆与安定湖学相应。”^②这段话大致概括了北宋浙江儒学的主要学派——湖学、明州学、永嘉学的源头与主流。

南宋时期的浙江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一方面，浙江活跃着南宋儒学各大流派，如程朱理学派，象山心学派都在浙江有其代表。另一方面，在浙江本土形成了几位大儒以及若干重要的学术流派。如以薛季宣、陈傅良、叶适为代表的南宋永嘉学派，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之学，以吕祖谦为代表的婺学，以北山四先生为代表的金华朱学，以浙东明州四先生（慈溪杨简、鄞县袁燮、奉化舒璘、定海沈焕）为代表的四明心学。尤其是叶适的永嘉学派，被全祖望誉为与朱、陆二派“遂称鼎足”、吕祖谦则与当时大儒朱熹、张栻并称为“东南三先生”。他们在浙江儒学史上均有显赫地位。他如慈溪黄震、桐乡的辅广、鄞县的王应麟都是南宋浙学的重要代表。

元王朝虽然存在民族歧视政策，但浙江仍然是儒学重镇，尤以金华、宁波著名。明儒王祚评论金华儒学说：“有元以来，仁山金文安公（金履祥）以其传于北山何文定公（何基）、鲁斋王文宪公（王柏）者，传之白云许文懿公（许谦），实以道学名其家……悉为世大儒，海内咸所宗师。”（黄宗羲编《明文海》卷二八六王祚《送胡先生序》）可见元代浙江的大儒“踵武相望”，接连不断，构成了元代儒学的基本演进脉络。在诸多大儒中，最有影响的有四位，即婺州的许谦、宋濂和四明的史蒙卿、程端礼。

（三）明代的浙江儒学：浙学的巅峰

明代儒学思潮在中国儒学发展史上具有特殊位置，其最具时代意义和价值的即在于从程朱理学向阳明心学的转化及其阳明学在中国诸地域及周边区域的传播和展开。

明代的浙江儒学，是由宋濂、刘基开其端，方孝孺继其绪，而由王阳明成其大，刘宗周殿其后。

一是明初浙学三大儒：一曰宋濂（1310—1381），字景濂，浙江浦江人，学者称“潜溪先生”。他是元末明初的儒学家。为学既宗理学，也宗心学，具有调和朱、陆之学又融合事功之学的倾向。二曰刘基（1311—1375），字伯温，浙江青田南田村人，以字行。刘基兼融儒道，讲求事功，博学多才，是一位“通儒”。三曰方孝孺（1357—1402），字希直，号逊志，学者称“正学先生”。浙江海宁县人。他是宋濂的学生，以刚直闻名天下。因不肯为明成祖朱棣篡位起草诏书，被“磔于市，坐死者八百七十三人”，酿成了历史上“灭十族”大祸。

二是王阳明与浙中王门。阳明心学的兴盛与浙中王门的形成，标志着浙江儒学走向了巅峰状态。

王阳明（1472—1529），名守仁，字伯安，浙江余姚人。他生于浙江余姚，卒于江西南安，归葬于浙江山阴洪溪乡（今绍兴市柯城区兰亭乡仙霞山）。生前获封新建伯，官至南京兵部尚书。后遭人诬陷，恤典不行。卒后三十八年，即明隆庆元年（1567年），被追赠为新建侯，谥“文成”。曾自号阳明子、阳明山人，学者称为阳明先生。

王阳明虽然在少年时期立下“读书学圣贤”的大志，但在青年时期，因感“圣贤难做”，故长期浸淫于词章之学，“出入

于佛老者久之”。

直到弘治十八年（1505年），阳明三十四岁时，才真正归本儒学。

王阳明一生历经磨难，经历了龙场悟道、南赣剿匪、南昌平叛、广西定乱等人生阶段，成就了“立德立言立功”的“真三不朽”业绩，创立了以“良知即天理”、“知行合一”、“致良知”、“明德亲民”为主要命题的良知心学，并通过各地讲学，创立了遍布南北的王门八派^③。八派之中，由王阳明在浙江的讲学活动形成的王门学派称为“浙中王门”。阳明良知心学的形成，为浙江儒学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同时也是浙江儒学走向巅峰并向周边传播进而形成异国阳明学派的一个成功范例，也是浙江儒学对中华文明乃至人类文明史的重要贡献。

黄宗羲在《明儒学案·浙中王门学案》序文中说：“姚江之教，自近而远，其最初学者，不过郡邑之士耳。”说明浙中是王学的发祥地和最早的传播地。他在《浙中王门学案》中罗列了徐爱、蔡宗尧、朱节、钱德洪、王畿、季本、黄绾、董沅、陆澄、顾应祥、黄宗明、张元冲、程文德、徐用检、万表、王宗沐、张元忭、胡翰等十八人为浙中王门弟子，又在《泰州学案》、《甘泉学案》中为周汝登、陶望龄、刘埭、唐枢、蔡汝楠、许孚远等浙籍王门弟子立传。这些浙籍王门弟子中，尤以徐爱、钱德洪、王畿、黄绾最为著名。

徐爱是王阳明《传习录》上卷的记录整理者。钱德洪，号绪山，余姚人；王畿，号龙溪，绍兴人。他们在王门中“所得最深”。然二人对阳明学的领悟互有深浅。诚如黄宗羲所论：“先生（钱德洪）之彻悟不如龙溪，龙溪之修持不如先生，乃龙溪竟入于禅而先生不失儒者之矩矱。”^④黄绾字叔贤，号久庵，台州黄岩人。官至礼部尚书。黄绾初闻阳明致良知之教，叹“先生真吾师也”^⑤，乃称门弟子。阳明死后，遭朝中大臣恶意指中，致使朝廷恤典不行，并下诏禁“伪学”。黄绾上疏力辩，说：“臣所以深知守仁者，盖以其功与学耳。然功高而见忌，学古而人不识，此守仁之所以不容于世也。”^⑥疏中列举王阳明四大功、三大学术旨要，可以说是阳明心学的捍卫者。

三是明朝中晚期的唐枢、许孚远和刘宗周。

唐枢（1497—1575）字惟中，号一庵，浙西归安（今属湖州）人。他标举“讨真心”三字为学术宗旨。其学兼综王阳明、湛甘泉。许孚远（1535—1604），是湖州德清人。他是唐枢的弟子，又是刘宗周的老师。他笃信良知之说，但反对援良知入佛。提倡“止至善”，以矫正王学流弊。其学术人格对刘宗周影响尤大。

刘宗周的“慎独”之学，是阳明后学一大亮点。刘宗周（1497—1575）字起东，号念台，学者称念台先生，又称蕺山先生。山阴县（今属绍兴市）人。他开创的蕺山学派，在浙学史和中国儒学史上都具有承先启后作用。他一方面对王阳明的“致良知”说给予高度评价，称“（阳明）先生承绝学于词章训诂之后，一反求诸心，而得其所性之觉曰‘良知’，因示人以求端用力之要，曰‘致良知’。‘良知’为知，见知不囿于闻见；‘致良知’为行，见行不滞于方隅。即知即行，即心即物，即动即静，即体即用，即工夫即本体，即下即上，无之不一，以教学者支离眩鹜、务华而绝根之病，可谓雷霆启寐、烈耀破迷，自孔孟以来，未有若此深切著明者也！”^⑦

但另一方面对王阳明的良知“四句教”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与修正。批评阳明“致良知”说有“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之病，其四句教“将意字认坏，故不得不进而求良于知；仍将知字认粗，故不得不进而求精于心。非《大学》之本旨明矣！”^⑧蕺山对阳明的批评与修正表现在：第一，标举“慎独”宗旨，用“独体”和“意体”代替阳明的“心体”和“良知”，并用“慎独”、“诚意”的修养论代替“致良知”的修养论；第二，将阳明“四句教”修正为蕺山新版：“有善有恶者心之动，好善恶恶者意之静，知善知恶者是良知，有善无恶者是物则。”^⑨刘宗周对王阳明的批评不一定切合阳明学本意，但实质上是针对王学末流蹈空袭虚、佞佛近禅之病起而施治，从而为清初实学开辟了新思路。

（四）清代浙江儒学：浙学的转型（上）

明清易代之际，理学批判思潮、经世实学思潮同时在中国特别是浙江蓬勃兴起。由明末大儒刘宗周开创的戴山学派在清初发生了学术分化，出现三大流派：

一是以桐乡张履祥为领袖的“由王返朱”的浙西学者，而形成清初浙西理学派。张履祥曾师从刘宗周，然亡国之痛促使他反思王学，最后摒弃王学而归本程朱理学。该派代表人物有桐乡学者吕留良，以“严夷夏之防”、“尊朱辟王”、惨遭文字狱“戮尸灭族”而著名，还有以“尊朱黜王”为宗旨的平湖学者陆陇其。他是“王学误国”论的鼓吹者；

二是以黄宗羲为领袖的清代浙东经史学派。黄宗羲经历了明清易代“天崩地解”之巨变。痛定思痛，撰著《明夷留书》与《明夷待访录》，喊出了“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和“天下为主君为客”的口号，从而奠定了他作为中国早期民主启蒙思想家的地位。

在学术上，他秉承阳明心学认同“圣人之学，心学也”的基本立场，进而提出“心无本体，工夫所至即其本体”、“必以力行为工夫”的“力行实学”，创立了以“明经通史”、经史并重为特色的“清代浙东经史学派”。该学派以浙东的宁波、绍兴为中心而扩展于浙西，影响至全国；其主要代表人物，除黄宗羲之外，还有黄宗炎、万斯大；万斯同、邵廷采、全祖望、章学诚、邵晋涵、王梓材；李邕嗣、郑梁、郑性；黄百家、陈訢、黄炳垕等。

除了上述两大派之外，清代浙江还涌现了多位特立独行而卓然成家的儒者，如陈确、谈迁、查继佐、毛奇龄、胡渭、朱彝尊、张岱、潘平格等人，还有乾嘉考据学在浙江的代表杭世骏、陈鱣、严可均等，他们各有名著传世，并且坚守了士大夫的志节。

（五）近现代浙江儒学：浙学的转型（下）

近代以来，儒学在东西文化交融的历史条件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其主要趋势表现为向经世致用、兼收并蓄、中西会通方向的转变。这一时期，浙江依然涌现了很多杰出的学者与儒家思想家，代表着浙学在近现代转型的新方向。著名的有主张“改革”、“更法”的龚自珍（1792-1841），有以礼为本、专治礼学的经史家黄式三（1789-1862）、黄以周（1828-1899）父子，有被时人誉为“山中宰相”的经学家俞樾（1821-1906），有复兴墨学并主张政治改革的朴学大师孙诒让（1848-1908）、有学问渊博、力主排满革命、被鲁迅誉为“有学问的革命家”章太炎（1869-1936）、有被誉为“千年国粹，一代儒宗”的“现代新儒家三圣之一”的国学大师马一浮（1883-1967）等。可谓大师辈出，群星灿烂。他们都继承了浙学优良传统，一方面，致力于研究学问、会通中西，注重阐发经学义理，另一方面力主改革、经世致用，以期弘扬儒道，振兴中华，是值得大书特书的。

三、浙江儒学的学术特色与基本精神

我们在第一部分简说了浙江儒学的源头与开山，在第二部分概述了浙江儒学的基本发展脉络。这里，还需要厘清浙江儒学与浙学的关系。自1992年以来，我在多篇论浙学的文章中讨论了浙学内涵的狭义、中义与广义之分。指出狭义的“浙学”概念是指发端于北宋、形成于南宋永嘉、永康、金华地区的以叶适、陈亮、吕祖谦为代表的浙东经史之学；中义的“浙学”概念是指渊源于东汉、形成于南宋、转型于明代、发扬光大于清代的浙东经史之学，包括东汉王充的“实事求是”之学、南宋婺学与永嘉、永康之学、南宋四明之学以及明代阳明心学、戴山慎独之学和清代浙东经史之学；广义的“浙学”概念即“大浙学”概念，指的是渊源于古越、兴盛于宋元明清而绵延于当代的浙江学术传统与人文精神传统。无论是狭义还是中义、广义，浙学的主流学术都是儒学。特别是狭义与中义涵义上的浙学，其主体就是浙江儒学。那么，在近两千年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浙江儒学形成了哪些特色，积淀了怎样的学术文化精神呢？在此谨陈管见。

（一）浙江儒学的学术特色

从宏观而言，浙江儒学具有三大特色：

第一是多元包容。浙江儒学从开山祖王充开始，在学术上就具备了多元包容、兼采各家的思想特色。王充学说的根本宗旨是“实事求是”。其学说在宇宙观、天道观方面批判了董仲舒等儒家的“天人感应”目的论，坚持了道家黄老学派的“元气自然”论，自称其“自然”之说“从道不随事，虽违儒家之说，合黄老之义也”。但他在治国战略上则称赞“仲舒之言道德政治，可嘉美也”（《论衡·案书篇》），并兼采了儒家法家的治国战略，说“治国之道，所养有二：一曰养德，二曰养力。……此所谓文武张设，德力具足者也”（《论衡·非韩篇》）。

在人性论问题上，他批判性地综合了各家之说，说“余固以孟轲言人性善者，中人以上者也；孙卿言人性恶者，中人以下者也；扬雄言人性善恶混者，中人也”（《论衡·本性篇》），并提出了自己的“性有善有恶”论。这都表现了王充学说的多元包容特色。不仅是王充，历史上的浙江儒家，大多具有“多元包容”特色，如宋儒叶适强调“中和兼得”、“崇义养利”，王阳明主张“折衷朱陆，会通佛老”，黄宗羲提倡“会众合一”，章学诚主张“道并行而不悖”等等，都体现了浙江儒学“会通诸家、多元包容”的学术特色。

第二是经世致用。浙江儒家历来重视经世致用，如王充特别强调“文为世用”，说文章“为世用者，百篇无害；不为用者，一章无补。”（《论衡·自纪篇》），叶适敢言功利，提倡事功之学，而反对空谈“道义”，他对董仲舒的义利观提出了尖锐的批判，说：“‘仁人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此语初看极好，细看全疎阔。……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耳！”（《习学记言》卷23）吕祖谦强调“学问本为实用”，主张学术必须“讲实理、育实材而求实用”（《东莱集》卷五《太学策问》），王阳明强调“知行合一”、“明德亲民”（《传习录》），黄宗羲说“儒者之学，经纬天地”（《赠编修弁玉吴君墓志铭》）、主张“经术经世，史籍应务”（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文》转引），又说“学问之道，以各人自用得着者为真”（《明儒学案发凡》）。这些论述，都深刻反映了浙江儒学的经世致用特色。

第三，从民本、亲民到民主的思想转型。王充在《论衡》中多次引用了管子“仓廩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论衡·问孔篇》）的名言，强调了国家富足对于人民信守礼义的重要意义，叶适、吕祖谦皆有明确的“仁政”、“爱民”思想，具有传统儒家的“民本”思想。到王阳明，则十分强调“亲民”思想，并以“明明德”为体，“亲民”为用。王阳明解释《大学》古本时强调“亲民”主张，强调：“亲民犹孟子亲亲仁民之谓，亲之即仁之也。……又如孔子言‘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便是明明德，安百姓便是亲民”（《传习录上》，载《王阳明全集》上册卷一），黄宗羲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明夷待访录·原君》，载《黄宗羲全集》第一册）的命题，张岱提出“予夺之权，自民主之”（《四书遇·孟子遇》）的命题，近代儒者孙诒让的“实业救国”主张等等，构成了浙江儒学史的“民本”思想传统，从而成为浙江儒学从民本到民主的一大思想特色。

（二）浙江儒学的基本精神

浙江儒学在各派各家的长期磨合过程中，逐渐凝聚了一些共通的基本精神。这些基本精神可以概括为：

第一，“实事求是”的求实批判精神。王充《论衡》的“实事求是”宗旨，代表着浙江儒学的求实批判精神。王充之后，浙江最富求实、批判精神的儒家思想家当属南宋的叶适、明清之际的黄宗羲和近现代的龚自珍。叶适的批判对象，上起孔子弟子，下至程朱理学诸家。他尤其深刻批判了汉儒董仲舒所谓“正谊（义）不谋利”、“明道不计功”的重义轻利价值观，而提出了他的“利者义之和，义者利之本”的“崇义养利”（叶适：《士学上》，载杨士奇《历代名臣奏议》卷五十五）价值观。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严厉批判了君主专制制度，喊出了“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的反专制口号，并提出了以“天下为主，君为客”为中心的具有民主启蒙倾向的社会改革纲领，龚自珍则严厉批判了清代社会制度的腐败而力倡“自改革”。

第二，“以民为本”的人文精神。富有人文精神，是浙江儒学的一大特色。这种人文精神除了传统的“民惟邦本”、重民爱民、为民请命之外，还有个农商本末的争论。传统儒家都坚持“农本商末”政策，但浙江儒家特别重视切于民用的工商业。例如叶适就提出“通商惠工，扶持商贾”的国家政策，并提出“四民交致其用而后治化兴。抑末厚本非正论”的重商思想（叶适：《习学记言》卷十九）。王阳明则明确提出“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归要在于有益于生人之道”的“四民同道”思想⁽¹⁰⁾，黄宗羲继承了叶适、王阳明的思想主张，在《明夷待访录》中从理论上厘清了所谓“本末之道”，提出了“工商皆本”⁽¹¹⁾的思想主张。这种“四民同道，工商皆本”的思想主张，较之古代儒家一般意义上的“民本”思想进了一大步，体现了浙江儒学重视发展工商业的新人文精神。

第三，“经世致用，知行合一”的实学精神。这种实学精神强调的是“学以致用”，有学才有用，无学便无用。而王阳明“知行合一”论的重点还是放在力行实践上。他说“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¹²⁾，这已经透露了“知行合一”重在行的倾向。而其后学黄宗羲更是心领神会，进一步将王阳明的知行观导向了“力行实践”观。黄宗羲解说王阳明“致良知”学说时说：

（阳明先生）以圣人教人只是一个行，如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皆是行也，笃行之者，行此数者不已是也。先生致之于事物，致字即是行字，以救空空穷理只在知上讨个分晓之非。⁽¹³⁾

于是，王阳明的“致良知”就成了“行良知”，即良知的实践了。这正是一种“知行合一，力行实践”的精神。可见，王阳明“知行合一”论，为浙江儒学的经世致用传统打上了特别重视力行实践的印记。

第四，“崇尚气节，正直敢言”的豪杰精神。浙江儒学历来有“崇尚气节，正直敢言”的好传统。从王充的“实事求是”到叶适的“习学记言”、方孝孺的“宁死不屈”、王阳明的“狂者胸次”、黄宗羲的“豪杰精神”，再到近代龚自珍的“自改革”、王棻的“气节为本”说，都彰显了浙江儒者“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品格。在浙江儒学史上，学识渊博且具有刚正不阿独立人格的学者代有人出，如王充、叶适、方孝孺、于谦、王阳明、刘宗周、吕留良、黄宗羲、全祖望、章太炎、马一浮等是佼佼者。尤其值得讴歌的是，在清代文字狱盛行、浙江许多学者受到迫害、又有许多学者躲进小楼搞考据的时候，以黄宗羲、万斯同、全祖望、章学诚为代表的浙东经史学派却仍然敢冒风险去提倡“经世致用”之学，去批判那种为专制君主服务的御用学风或脱离实际的空虚学风，这确乎令人肃然起敬。

第五，“教育优先、人才第一”的文教兴邦精神。浙江之所以获得“文献名邦”、“人文渊薮”的雅号盛誉，并不是仅由山水之美自然陶冶出来，而是由“人文化成”逐渐升华而成，即教化的结果。而教化之行，必先兴办教育，教育兴而人才出，这是千古不移之理。浙江自唐五代以迄近现代，形成了文教兴邦、人才辈出的优良传统。在教育方面，不仅官学普及于各府、州、县，而且民间办学蔚然成风，如精舍、书院、义塾、书堂、社学、私塾、学校等等，形式多样。仅以书院为例，浙江所建书院数量在全国所占比例，唐、五代居第三位，宋、元、明均居第二位，清代则居全国第一。浙江的书院，不仅历史悠久、数量众多，而且学风活泼，人才辈出。而儒家学者是文教兴邦的生力军。特别是吕祖谦、叶适、王阳明、刘宗周、黄宗羲、全祖望等，都是致力于书院教育的大儒。至于近现代，更涌现了一大批著名儒家教育家，如章太炎、孙诒让、马一浮等，他们的教育实践与教育思想，是浙江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

四、浙江儒学的历史贡献

如果说在东汉王充之前，浙江儒学尚未独立成型而基本上是源自中原、齐鲁地区的儒学在浙江的输入式形态，那么，在王充之后，浙江便形成了独立成型、独具特色的儒学形态了。如王充的“实事求是”之学，胡瑗的“明体达用”之学，叶适的“崇义养利”之学，王阳明的“良知心学”，刘宗周的“诚意慎独”之学，黄宗羲的“经世应务”实学，龚自珍的“更法改革”之学，章太炎的经史新学，马一浮的“六艺”之学，等等，都是自成体系的儒学形态，这些理论形态，不仅对浙江儒学的发展影响巨大，而且对中国儒学史、思想史贡献至伟。其历史贡献大致有四大方面：

一是根植培育了浙江学术文化的精神传统。虽然系统性的浙江儒学传统是从王充开始。但儒学的思想元素，在王充以前的古越国，甚至在浙江先民那里已经萌芽并代代相传。例如河姆渡遗址出土的双鸟异日牙雕、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羽冠人面兽身玉琮，象征着浙江先民已经萌芽了“天人合一”“万物一体”观念。古越国勾践君臣“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兴越灭吴的故事，则积淀了以民为本、自强不息、待时而动的精神与治道。特别是王充《论衡》所体现的实事求是、经世致用、多元包容、德力俱足的哲学精神与治国之道，奠定了浙江儒学的思想基础。

我们查看《四库全书》许多名家大著对王充《论衡》的引证与好评即可以找到很多有力的证据^[14]。例如南宋经史名家王应麟著作中即有十多条微引《论衡》。又如南宋浙江朱学传人黄震著《古今纪要》与《黄氏日抄》也有多处称引王充《论衡》。如《黄氏日抄》卷四十六《读史·史记·宋世家》：“荧惑守心，（宋）景公忧之。司星子韦劝其移于相，不可；移于民，不可；移于岁，又不可。子韦称：天高听卑，君有君人之言三，荧惑宜有动。候之，果徙三度。感应之机何速耶？王充《论衡》尝斥其妄，殆正论也。”至于近代浙江学术大师章太炎名炳麟者，则高度称颂了王充的学术精神（引文见本文第一部分）。这些，都体现和传承了王充“实事求是”的精神。也说明王充《论衡》所代表的浙学精神，确实根植和培育了浙江学术文化的优良传统。

二是影响了当时及后代的中华文化传统，丰富了中华人文精神的精神宝库。除了前述浙江有诸多学者传承发扬了王充《论衡》的学术精神之外，王充的学术精神在后世中国学者中也有广泛的影响。例如南朝宋的史学家范晔在所著《后汉书》立《王充传》：称王充“少孤，乡里称孝……博通众流百家之言……好论说，始若诡异，终有理实。”唐代大儒韩愈撰著《后汉三贤赞》，曰：“王充者何？会稽上虞。……师事班彪……遂通众流。

闭门潜思，《论衡》以修。……终于永元。”其他如五代刘昫撰《旧唐书》、宋代郑樵著《通志》、宋代欧阳修撰《新唐书》、元代托克托编《宋史·艺文志》、南宋朱熹的《楚辞辩证》、魏了翁的《尚书要义》《周易要义》、明代冯复京撰《六家诗名物疏》、清代王夫之撰《诗经稗疏》、方以智撰《通雅》、顾炎武著《日知录》、阎若璩著《古文尚书疏证》、徐乾学撰《读礼通考》、秦蕙田撰《五礼通考》、惠栋著《易汉学》等历代名儒皆在其著作中引证或著录了王充《论衡》的考辨名言，在此恕不赘引。可见王充在学术界影响之大。甚至连清朝皇帝乾隆，也亲自撰著《御制读王充论衡》的评语，一方面承认王充论衡“识博而言辩，颇具出俗之识”，另一方面又诋毁王充是“背经离道、好奇立异之人”，诬其书“非圣灭道”、“犯非圣无法之诛”，但他还是同意将《论衡》收入《四库》，则从反面确认了王充在中国思想文化史和学术史上的巨大影响。

不仅王充如此。浙江儒学史上的许多儒者诸如陈傅良、陈亮、叶适、吕祖谦、刘基、宋濂、方孝孺、王阳明、刘宗周、黄宗羲、黄宗炎、陆陇其、张履祥、吕留良、万斯同、万斯大、邵廷采、邵晋涵、全祖望、章学诚、王梓材、钱大昕、黄以周、龚自珍、俞樾、章太炎、马一浮等，以及浙江儒学史上产生的学派与学术群体，例如两宋永嘉学派、庆历五先生，南宋婺学、四明陆学、北山四先生、姚江王学、浙中王门、明末蕺山学派、清初浙东经史学派、衢州孔氏南宗等，都对中华文化的形成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从而丰富了中华人文精神的精神宝库。尤其是王阳明、刘宗周、黄宗羲、章太炎、马一浮，都属于大师级的思想家与学问家，他们不仅对浙江，而且对中国思想文化史作出了重大贡献，并在东亚儒家文化圈和世界思想文化史上产生重要影响，拥有崇高的地位。

五、浙江儒学的当代价值

上述浙江儒学的基本精神在当代浙江的创业创新发展以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践中正在焕发出巨大的力量。浙江儒学以“实事求是”为代表的求实批判精神，为当代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改革开放的既定国策，开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提供了一种科学务实的思维方法和精神动力。浙江儒学既讲道义又敢言功利的“崇义养利”价值观，经世致用、知行合一的实学精神，明德亲民、以民为本的人文精神，自强不息、勇于创新的开拓精神，已成为当代浙江经济发展的内在持久的动力。浙江儒学的“多元包容”精神，为中国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和推进全球化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借鉴。从一定意义上说，当代浙江精神是浙江儒学精神传统的发扬光大，当代中国的发展也吸收了浙江儒学的思想元素与文化基因。因此，我们很有必要系统总结浙江儒学发展的来龙去脉，从中提炼其基本的精神与核心价值，揭示其有助于当代浙江与中

国经济、社会、文化全面发展的有益启示，以期既为梳理浙江历史文化的客观发展作出学术贡献，也为落实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以德兴国，以文化人”文化发展战略提供智力的支持。

我们可以从东汉至当代的浙江儒学中五种独具特色的思想型态思考浙江儒学的当代价值：

一是东汉王充以“实事求是”为根本宗旨的求实批判之学。王充处在“天人感应目的论”甚嚣尘上、各种虚妄迷信危害世道人心的思想混乱时期，高举“疾虚妄，定真是”的大旗，以“实事求是”为学术宗旨，批判各种虚妄迷信，从而开创了浙江思想求实批判、经世致用的新纪元。其书其学受到后世许多著名学者、思想家的引用与好评（如蔡邕、范曄、韩愈、吕祖谦、王应麟、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方以智、惠栋、章炳麟等都徵引了《论衡》的批判性论述），从而成为浙江第一个伟大思想家。在当今改革开放的年代里，王充的唯物主义无神论思想，其“实事求是”的认识方法论，其“德力俱足”的治国之道以及“文为世用”的经世致用主张，则为新时代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提供了思想的启示与历史的借鉴。

二是南宋永嘉学派代表叶适以“崇义养利”为核心价值的功利之学。南宋时期浙江温州地区以叶适为主要代表的永嘉功利学派，是南宋浙江儒学的主要流派。朱熹将叶适永嘉之学、陈亮永康之学和吕祖谦的婺学一概视之为“浙学”并批评“浙学专言功利”⁽⁴⁵⁾。一般都据此批评叶适所代表的浙学是功利之学。其实是一种严重的误解。叶适固然讲功利，但他是针对董仲舒“正义不谋利，明道不计功”（见《汉书·董仲舒传》）的重义轻利说而言，批评董仲舒“疏阔”而作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尔”（《习学记言》卷23）。叶适批评的是排斥功利的道义空谈，实际上他是既讲功利也讲道义的。这从明人杨士奇编著的《历代名臣奏议》所引叶适奏议《士学》篇可知，叶适的核心思想是“崇义以养利”。该书引叶适上宋孝宗奏议《士学上》曰：“儒者以迂阔见非于世，所从来远矣。”

三代以前无迂阔之论，盖唐、虞、夏、商之事虽不可复见，而臣以《诗》《书》考之，知其‘崇义以养利，隆礼以致力’，其君臣上下皆有阔大迂远之意。”清儒全祖望在《宋元学案·水心学案》的按语中评论叶适说：“永嘉功利之说，至水心始一洗之。……乾（道）、淳（熙）诸老既歿，学术之会，总为朱、陆二派，而水心断其间，遂称鼎足。”与朱、陆二派鼎足而三，可见永嘉功利学派地位之高，影响之大。所谓“始一洗之”者，意指洗去永嘉功利学说之弊。由此可见，叶适是反对排斥功利只讲道义的重义轻利倾向，而是主张义利兼顾的。叶适还曾援引《周易》《孟子》之言以论证义利关系，说：“古人之称曰‘利，义之和’，其次曰‘义，利之本’，其后曰‘何必曰利’。然则虽和义犹不害其为纯义也，虽废利犹不害其为专利也。此古今之分也。”（《习学记言》卷11）这突出证明了叶适是“崇义养利”派，而非功利至上派。叶适的“崇义养利”之学在当代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期对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起到了破除教条、解放思想的重要作用。有力地体现了浙江儒学“敢为天下先”的积极进取精神对于当代浙江乃至当代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社会文明日新月异巨大推动作用。

三是王阳明以“致良知”为核心命题的良知心学。王阳明以“良知”为本体、“致良知”为修养方法、“知行合一”为实践工夫、“明德亲民”为政治应用的心学体系，是针对当时官方哲学——程朱“格物穷理”之学的日益教条化与思想僵化而兴起的思想解放运动，他冲击的是“今日格一物，明日又格一物”的繁琐“支离”之学，而提倡“简易直截”的良知心学，从而高扬了“求理于心”的主体精神。在政治哲学上，王阳明则以“明德亲民”的民本论区别于程朱的“修己治人”之学，从而与孔子的“修己以安百姓”及孟子的“亲亲而仁民”的民本思想直接接轨。

在当代，阳明心学由于习近平总书记的推崇而成为显学，至少在四个方面突出显示了其时代价值：第一，阳明学确立以道德良知为核心的道德理想主义，对于救治当今社会道德滑坡、唯利是图、物欲横流的弊端是对症良药。第二，王阳明良知学高扬主体性，启发了以黄宗羲为代表的民主启蒙思潮。从王阳明的“亲民”到黄宗羲的“民主”思想，对当代中国建立“民主仁政”的治理模式具有借鉴作用。第三，阳明学折衷朱陆、会通佛老的和而不同精神，体现了一种多元和谐的文化取向，为全球化时代文化交流的多元包容格局提供了历史的借鉴。第四，阳明学知行合一、力行实践的精神为我们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改革开放的既定国策，不断开创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提供了科学务实的思维方法和精神动力。总之，阳明学并不是僵死的学问，而是具有强大生命力和时代价值的鲜活文化。值得深入发掘、发扬光大。

四是黄宗羲以“民主君客”为核心价值的“力行”实学。黄宗羲处在明亡清兴“天崩地解”的社会大动荡和思潮激荡时期，对秦以下的君主专制制度作了深刻的反思，写下了脍炙人口的政治名著《明夷待访录》，一方面以其“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的论断批判了秦以来延续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另一方面则设计了“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未来社会蓝图，从而显示了其政治思想的民主启蒙性质。在哲学上，黄宗羲深刻批判了当时流行的心学与理学崇尚空谈的弊端，称“今之言心学者，则无事乎读书穷理；言理学者，其所读之书不过经生之章句，其所穷之理不过字义之从违……天崩地解，落然无与吾事，犹且说同道异，自附于所谓道学者”⁽¹⁶⁾，而提倡“致字即是行字”、“必以力行为工夫”的“经世应务”之“力行”实学，这个“力行”实学是对传统儒家“君以民为本”的民本思想旧范式的超越，而具有了“主权在民”的“民主实学”新性质。黄宗羲的“民主实学”不仅对清末民初推翻君主专制的民主革命起了积极启蒙作用，而且对在新时代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仁政”新制度具有重要借鉴作用。

在我看来，黄宗羲的“力行”实学中体现的人文精神是历久弥新的，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第一，黄宗羲的“民主君客”论和“万民忧乐”论，伸张了主权在民、君须为民服务、以万民忧乐为治乱标准的民主思想观念。第二，黄宗羲关于“治法”与“治人”的讨论，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法治、德治、人治”的关系及其利弊，促使我们为建立基于民主政治的现代法治社会而作出不懈的努力。第三，黄宗羲的“工商皆本”与税制改革等经济思想主张，可以为我国发展工商业，实行科学的经济政策提供借鉴。第四，黄宗羲关于学校功能和改革取士制度的理论观念，可以启迪我们正确认识学术对于政治的引导作用，深刻认识不拘一格选用人才的重要意义。第五，黄宗羲提倡的“必以力行为工夫”、“工夫所至即其本体”的哲学思想，是一种重视实践的哲学；而他在长期哲学探索中总结出来的“一本万殊，会众合一”的辩证思维方法，更具有开放性、兼容性思维的特征，对于我们在全球化背景下促进异质文化交流、推动文化创新、提升人文精神具有积极的指导作用。

五是马一浮以“六艺该摄一切学术”为核心命题的现代新经学。马一浮先生被当代著名儒学家汤一介先生誉称为“现代儒学三圣之一”（另二位是梁漱溟、熊十力），是“经学思想家”和“思想理论大师”（见2013年浙江古籍版《马一浮全集·序》）。这揭示出马一浮学说的特质是“新经学”。马一浮生当西学思潮汹涌澎湃大有取代中华五千年传统文明的二十世纪初中叶，以其对经学的深厚造诣勇敢地站出来为国学正名，捍卫中华文化核心价值（仁、义、圣、智、中、和），坚决抵制和拒斥西化思潮对中华文化的批判与否定。

马一浮新经学中最有代表性的命题，一是“国学者六艺之学”，二是“六艺该摄一切学术”。马一浮在中国全境几乎沦陷于日本帝国、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作出大胆断言：“世界人类一切文化最后之归宿必归于六艺，而有资格为此文化之领导者，则中国也”，并且批判说：“今人舍弃自己无上之家珍，而拾人之土直绪余以为宝，自居于下劣，而奉西洋人为神圣，岂非至愚而可哀！”又说：“六艺之道是前进的，决不是倒退的，切勿误为开倒车；是日新的，决不是腐旧的，切勿误为重保守；是普遍的，是平民的，决不是独裁的，不是贵族的，切勿误为封建思想。要说解放，这才是真正的解放；要说自由，这才是真正的自由；要说平等，这才是真正的平等。”⁽¹⁷⁾这一大段对六艺之教性质的论述与中华文化发展前景之展望，虽未免过于理想化，但也充分体现了马先生的文化自觉与自信。

马一浮的国学观对于当代中国在全球化潮流中充分认识中华文化核心价值、提升全民族的文化自信具有重要借鉴意义。我们今天思考马一浮新经学的当代价值，不得不敬佩马先生的远见卓识，他的六艺之教，鲜明地展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觉与自信，可以使广大士民深刻了解中国文化的源头在“六经”，六经中包含着至真、至善、至美的人类普世价值，这个普世价值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并且与西方人文主义是殊途同归的。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浙江儒学在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积淀了深厚的人文精神传统，浙江儒学之最具特色的思想型态是王充的“实事求是”之学、叶适的“崇义养利”之学、王阳明的“良知”心学、黄宗羲的“力行”实学、马一浮的“六艺”之学，他们的思想宗旨与学术命题不仅开风气之先，而且具有普世价值，仍然是新时代的思想创新与治理模式创造性发展的良好借鉴。

注释:

1 如《隋书·经籍志》和《四库全书·子部》都将王充的《论衡》归入“杂家”类，台湾现代新儒家徐复观等也视王充为杂家，见徐复观《汉代思想史》卷二《王充论考》。

2 全祖望：《宋元学案卷六·士刘诸儒学案案语》，载沈善洪、吴光主编《黄宗羲全集》第三册《宋元学案一》，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5 年增订版，第 316 页。

3 黄宗羲著《明儒学案》按地域记载了王门七派，即浙中、江右、泰州、南中、北方、粤闽、楚中王门七大派，上世纪八十年代，贵州学者张新民等搜集大量资料论证了黔中王门的存在，故学界一般称为王门八派。

4 黄宗羲：《明儒学案》卷十二《浙中王门学案二·钱德洪传》，载《黄宗羲全集》第七册，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5 年增订版，第 254 页。

5 黄宗羲：《明儒学案》卷十三《浙中王门学案三·黄绾传》，载《黄宗羲全集》第七册，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5 年增订版，第 318 页。

6 钱德洪：《阳明先生年谱三》引黄绾疏辞。载吴光、钱明、董平、姚延福编校《王阳明全集》卷三十五，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 年简体字标点本下册，第 1092 页。

7 《黄宗羲全集》第七册，《明儒学案·师说》，第 14 页。

8 黄宗羲：《明儒学案》卷六十二《戴山学案·良知说》载《黄宗羲全集》第八册，第 975 页。

9 以上第一、第二条引述之戴山语录散见于《明儒学案·戴山学案·语录》，载《黄宗羲全集》第八册，第 896、901、904 页。

10 王阳明：《节庵方公墓表》，载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中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776 页。

11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财计三》，载沈善洪主编、吴光执行主编《黄宗羲全集》第 1 册，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5 年 1 月版，第 41 页。

12 王阳明：《传习录中·答顾东桥书》，载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37 页。

13 黄宗羲：《明儒学案》卷十《姚江学案序》，见《黄宗羲全集》第七册，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97 页。

14 检索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四库全书》电子版，浙江学术史上有许多知名浙籍学者引用王充《论衡》的考论，或记其生平，赞其成就，举其大者，如三国时吴国历史学家、山阴人谢承著《后汉书》，南宋时期目录学家余姚人高似孙著《纬略》《子略》，理学家金华人吕祖谦著《少仪外传》，文史学家鄞县人王应麟著《通鉴地理通释》一、《汉艺文志考证》、《困学纪闻》、《玉海》等，朱子学传人、上慈溪人黄震著《古今纪要》《黄氏日抄》，明末清初经史学家，余姚黄宗羲编《明文海》，嘉兴朱彝尊著《经义考》，萧山毛奇龄著《古文尚书冤词》《易小帖》，德清胡渭著《易图明辨》《禹贡锥指》，平湖陆陇其撰《四书讲义困勉录》，鄞县万斯同著《儒林宗派》等，清中叶朴学家杭世骏著《三国志补注》等均征引王充《论衡》。可见王充在浙学史上影响巨大。

15 黎德靖编：《朱子语类》卷 123，王星贤点校本，中华书局 1994 年版，第 2967 页。

16 黄宗羲：《南雷文定·留别海昌同学序》，载《黄宗羲全集》第十册，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645-646 页。

17 马一浮：《泰和会语·论西来学术亦统于六艺》（1938 年讲于避寇江西、浙江大学西迁途中的演讲），载吴光主编《马一浮全集》第一册上，浙江古籍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19-20 页。